

文化资本主义在文化保存及校本课程的作用

姜添辉*

[摘要] 全球化体系助长美国取得霸权地位,并对国际社会输出其霸权文化,尽管此种情况提升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但却产生抗拒论与融合论两种争辩。抗拒论主张,输入国家为保护自身的主权,以文化本土化的策略来维护国民的国家认同;融合论认为,由于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执行者,所以能将全球化压力转化成自身需求,这种全球在地化的现象能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本文指出这种争辩的关键点是,将能动性以及社会结构视为两个分立的维度,致使忽视他们的互补性。由于文化资本主义符合权力菁英的经济利益原则,这能使文化保存成为国家的重要政策,此种取向可提供更好的平台,地方居民得以藉此发挥文化创新的能动性。

[关键词] 文化本土化;全球在地化;文化保存;文化资本主义;校本课程

一、引言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资本帝国主义的美国扮演跨国公司角色,对国际社会输出新自由主义。^①这种举动促进全球化发展,并使资本主义成为世界体系的主要驱动力。^②此种情境大幅扩张国际贸易规模,其庞大资本利益使企业重心开始从国家内部转向国际舞台,这种转变标示出去国家化的危机。^③由于全球化带动区域性经济体的发展,以利于商品与服务进行跨国性的流动,这也削弱个别成员国对国际贸易的控制权。^{④⑤}再者,全球化大幅推升国际经贸机构的影响力,其成员国必须遵从这些国际机构的规范。上述这些变化显示出,全球化带动可观的权力流动,个别国家被迫将国际经贸控制权让渡给国际机构,由于美国实质支配大部分国际机构,所以上述权力等于流向美国的手中。^⑥

由此而言,全球化强化美国的霸权地位,此种情境有利于美国对国际社会输出其霸权文化,麦当

*哲学博士,郑州大学全球化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社会学学会教育社会学分会(RC04)副会长,450001。

①B. Berberoglu,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Nation-state: Imperialism, Class Struggle, and the State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 21—23.

②I.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3—41.

③M. Miyoshi, "A Borderless World? From Colonialism to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in R. Wilson and W. Dissanayake (eds.),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London: Duke University, 1993, pp. 78—106.

④A.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4—67.

⑤K. Ohmae, "The Rise of the Region State", in P. O' Meara, H. D. Mehlinger and M. Krain (e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a New Century*,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3—100.

⑥W.I. Robinson,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3—53.

劳化 (McDonaldization) 便用以描述, 美国霸权文化将大幅取代输入国家的当地文化。从文化模仿的视角而言, 这种文化取代的可能性极高, 人类社会往往存在往强势靠拢的模仿心理, 因为财富被视为是个人能力的成果, 如此财富便取得卓越象征, 此种卓越性使社会大众产生崇拜与模仿心理。^① 美国作为当前的世界超级强国, 这种先进地位便容易取得上述的卓越地位, 并成为许多国家的模仿对象。此种模仿现象显现于, 许多国家将美国的大学管理模式视为改革范式。具体而言, 这些国家以解除管制的方式, 来强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 试图透过这种自由市场逻辑, 以提升其运作成效。这种效能的概念进而正当化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私有化等措施, 所以学术资本主义 (academic capitalism) 得以畅行无阻。^② 又如许多亚洲国家没经过文化反思的历程, 便主动引入央格鲁-撒克逊范式 (Anglo-Saxon paradigm), 试图藉此增强其大学的国际化, 以提升他们的国际知名度。^③

这种模仿心理更加强美国文化的霸权地位, 这使美国霸权文化长驱直入, 并危及输入国家的地方文化, 由于文化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为了维护国民的国家认同以保护自身主权, 这些国家被迫采取文化本土化 (cultural localization) 的策略, 以抵抗强势文化的入侵。^{④⑤} 其他学者则认为, 全球化的普遍主义以及个别国家的地方特殊性存在兼容性, 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 的概念便用以解释这两者的结合。^⑥ 这种互动关系彰显出的原则是“全球思考与地方行动”, 此种原则能缩减全球化与各地的差异, 因此全球在地化包含文化互动与本地化 (indigenization) 的特征, 这些特征反映出, 好莱坞与麦当劳被错误解读成美国化的象征, 为了满足地方需求, 美国文化已被重新诠释与本地化。^⑦ 这种本地化能使输入国家以文化融合的方式进行动态性的文化转化, 因此全球在地化是特定情境化文化的重新诠释, 此种诠释使巨观性的全球化及微观性的本土化之间产生意义融合。

上述文化本土化策略是以国家的政治行动抗拒强势文化的入侵, 这种抗拒论采取结构取向的思维, 认为社会成员的个别化意识汇流于国家, 如此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能以由上而下的模式启动文化保护工程。然而, 这种论点将国家定义成同质化的组成, 致使忽视内部的权力关系。再者, 这种结构取向也忽略个体的能动性。全球在地化的论点则强调消费者的主体性, 他们能以主观偏好重新诠释文化的意义, 进而成为外来强势文化的主宰者。尽管如此, 此种能动性取向却将个人意向独立于社会情境之外, 容易将想要误认为结果。由此而言, 抗拒论与融合论相互影射彼此的缺失与优点, 所以应探究在全球化体系中, 个体能动性的文化创新与国家的权力运作模式, 透过掌握这两者的内涵与属性, 据以发展文化保存的有效策略。

二、个体能动性与文化创新

吉登斯认为, 结构主义无法解释后现代社会的分歧现象, 因为传统与全球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这乃根源于对时间与空间的控制, 仪式与礼节是集体记忆的产物, 透过社会成员主观诠释产生

①T.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94, pp.15—42.

②G. Rhoades and S. Slaughter,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Privatization as Shifting the Target of Public Subsid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R. Rhoades and C. A. Torres (eds.), *The University, State, and Mark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3—140.

③K.H. Mok, “Questing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Asia: Crit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11, 2007, pp. 433—454.

④B. Lingard, “It is and it isn’t: Vernacular globaliz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and restructuring”, in N.C. Burbules and C. A. Torres (eds.),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79—108.

⑤F. Rizv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Global Imagination”, in H. Lauder, P. Brown, A. Dillabough and A.H. Halsey (eds.),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05—226.

⑥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p. 130—183.

⑦H. H. Khondker, “Glocalization as Globalization: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cal Concept”, *Bangladesh e-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 no. 2, 2004, pp. 12—20.

的反复性社会经验,这种集体记忆演化其本身的型态,并保存于传统文化中。如此,传统的连续性是仰赖于对时间及空间的控制。相反的,全球化是在远处运作(action at distance),其力量并非基于时间的沉淀,而是空间的持续重建。由于精进技术带来物质与社会经验的多重性,这提供社会成员进行个人化反思的空间。^①此种关联性显示,特殊化消费、生产、创新与信息持续影响个人化能动性,因此应该在社会情境中检视其运作型态。尽管特殊性消费需求少量与多样化的商品,但是资本家往往认定全球化市场大幅提升产品之间的价格竞争,如此大量制造才能有效降低成本,以确保利润。创新不仅解决这种两难情境,并且引领生产模式的变革,以往对劳动者进行各种监控的规则模式,现在则转向自我要求的弹性型态,此种转变强化工作者的能动性。但是,此种反思应置放于全球化的讯息与沟通情境之中,因为这种情境强调知识经济或是专家系统的重要性,当个人化产生于这种系统或是结构时,社会成员较少受到传统或是习俗的控制。尽管如此,解释取向往往是自我反思的核心,因为能动性的运作需求相互或是分享性经验,这种经验需透过社会参与才能取得。^②

上述观点强调,全球化不但不会产生同质性的危机,反而赋予社会成员更大的个人化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使他们以主观意向诠释外来文化。如此,消费者往往是文化精致化的催生者,他们并非全然接受外来强势文化,而是以自身的喜好或是生活的便利性,择取其中的某些元素,纳入其消费型态中。^③这种建构取向指向,能动性使个体成为文本(text)与消费之间的主宰者,消费者并非无知的接受者,他们以自身的思维重新诠释文化的意义。这种关联性符合霍尔的编码(encoding)以及解码(coding)理论,编码是文本制造,此种制造必须将讯息编制成意义性话语,并且须在制度化社会关系的语言规则下进行传播,其意义方能被理解。后者是消费者以自身的观点重新解释文本的定位与意义。如此,编码与译码之间无法完全吻合,其中落差取决于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社会关系与位置之结构性差异,而且接收者的主观性成为影响这种理解的主要因素。^④这样一来,能动性是进行解码的具体行动,并构成消费者与商品的连结。这种连结指向,尽管消费者无法制造商品这类文本,但是他们并非受制于文本,相反的,他们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择取特定物品,个人偏好构成选择(selection)行为,这种能动性并扩张到文本的定位,亦即消费者能以自身价值观对文本意义进行诠释(interpretation)。由此而言,消费者的主观意识是影响文本存在的主要因素,这种能动性逆转文本与消费者的关系,从受制者变成主导者。^⑤相关研究证实这种能动性的作用,移居美国的难民学生必须克服语言障碍,他们以熟练策略将自身条件转变为优势,进而熟悉新情境的权力关系,这种能动性使他们克服社会与文化的障碍,这不仅提升自身的英文识字能力,并能藉此建构本身的认同。^⑥另一研究探讨科威特观众是否会内化美国电视节目传递的价值观?如性别平等与自由等,研究显示,他们大多有崇拜美国文化的倾向,大部分观众则采取实用性或是娱乐的角度观赏这类电视节目。^⑦

这些研究共同证实,行动者运用创新策略转化外在文本的地位,或者以自身价值观重新诠释文本的意义,无论转化或是诠释皆彰显能动性使个体成为文本消费的主导者。由于个体往往依据文本属性

① A. Giddens,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 Beck, A. Giddens and S. Lash (ed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6—109.

② S.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and Community", in U. Beck, A. Giddens and S. Lash (ed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0—173.

③ T. H. Chiang, "Is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able to Subjugate Local Cultures of Importing Countries? A Constructive Analysis on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Localiz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vol. 46, no. 13, 2014, pp. 1412—1426.

④ S. Hall, "Encoding, Decoding", in S.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90—103.

⑤ [英]约翰·史都瑞:《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张君玫译,台北:巨流,2002年,第49—56页。

⑥ L. K. Sarroub, "Glocalism in literary and Marriage in Transnational Lives", *Critical Inquiry in Language Studies*, vol. 6, no. 1—2, 2009, pp. 63—80.

⑦ A. A. Al-Kandari and M. Hasanen,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Television Program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Kuwait: A Synthesis",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vol. 28, no. 1, 2009, pp. 57—74.

进行能动性的运作,所以文本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相关研究进一步发现,此种互动产生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而持续引领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以往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以情境需求纪录民众的生活与记忆,这与上流文化存在极大的区隔,但是后来的商品化与大量制造,大众文化将上流文化的元素整合成新的形式。^①这种互动性标示出,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文化危机是预设性的意识形态,文化之间并非取代的作用,而是融合或是混合化(creolizations)的历程,欧洲与美国的文化流动呈现此种现象,以往西欧对美国输出上流文化,由于许多欧洲人受迫于法西斯主义逃难到美国定居,此种上流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力在1930年代达到高潮,但从1945年之后开始逆转,因为美国流行文化在西欧获得广泛的认可,此时上流文化与流行文化的界线开始消失。这种现象指向,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有助于文化创新,因此很难确定现代文化的特定元素是最早起源于何处。^②伊斯兰教世界与欧洲之间亦存在密集的文化交流,特别展现于音乐、服饰、艺术与建筑等方面,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文化盛行于地中海地区,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文化影响中东的伊斯兰教地区。^③

上述论点共同陈述个体具有反思能力,以此开启能动性,继而使个体以自身的主观意向界定文本的意义,因而消费者成为商品的主宰,并引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创新。但是这种诠释取向过度偏向微观面的个体意向体系,致使漠视宏观面的社会结构以及其权力运作,意向的达成往往涉及个体的能力与行动空间,能力与行动空间并非纯然想象之物或是个人的欲望,这些皆受到社会文化与制度的制约。因此须将能动性放置在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之中,才能揭露文化本土化或是全球在地化的真貌,这种关联性凸显国家运作型态的重要性。

三、国家的权力运作型态

一些学者认为,中立角色与正向职能使国家采取转化性策略,以应对全球化的要求。尽管全球化影响国家的内部结构,但是国家仍是全球化的执行者,他们以自身需求能持续将全球化转变为新的形态。^④再者,在这种全球在地化的情境中,各国政府必须进行有效的管辖与治理,所以他们往往扮演启动者、协调者与监督者的角色,这些角色使他们以不同方式调整自身权限的运作方式,这种调整无损于他们的统治权。^⑤相关研究证实此种关联性,知识社会产生技术与政治的开放,为克服这种挑战,挪威政府引进新的学校课程,以强化学生的基本素养,如此,挪威教师必须以反思途径进行自我提升。然而,这种开放产生一定程度的风险,因此需要进行控制,这导致挪威政府设定自我改善的框架,并辅以全国性考试的监督机制,此种现象反映出,全球化并未实质削弱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权。^⑥

尽管上述观点强调国家具备客观角色,并能运用其正向职能将全球化压力转变为符合自身需求的型态,但是这种功能取向未说明国家机器的内部权力结构以及其运作型态。由于国家是由许多团体构成,这种结构赋予国家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因而产生客观性与中立性的假象。但事实上,统治团体能透过退让、妥协与协商等策略,把持国家机器的运作,这种特性展现于社会公平的议题

①D. Macdonald,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in J.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pp. 29—45.

②V.R. Berghahn,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The Debate on 'Americanization' amo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ians", *Cold War History*, vol. 10, no. 1, 2010, pp. 107—130.

③G. Mélangé,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2nd ed.)*,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p. 128—136.

④P.Y. Hong and I. H. Song, "G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Global and Local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53, no. 5, 2010, pp. 656—670.

⑤C. K. Sharma, "Emerging Dimensions of Decentraliz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dian Journal of Federal Studies*, vol. 1, 2009, pp. 47—65.

⑥T. A. Trippstad, "The Global Teacher: The Paradox Agency of Teaching in a Globalized World",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vol. 14, no. 1, 2016, pp. 9—23.

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劳工阶级不但未能享受资本发展的成果，反倒成为被剥削对象，但是劳工阶级并非质疑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分配模式，而是要求社会公平，这使统治团体运作国家机器传播民主价值观，亦即民主政治体制能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公平地位，贫富差距是个人能力的产物，这种途径成功地将结构化的不公平问题转移到个人能力的范畴。^①此种关联性显示出，国家往往成为统治团体打压劳工阶级的道具，社会话语能合理化这种社会控制，因为社会话语具备教化 (schooling) 功能，它能对社会成员灌输特定价值观，以将他们转变为柔顺化个体 (docile body)，由于他们已成功内化统治团体的观点，所以成为既有社会思维的守护者与支持者。^②新西兰政府便运用社会话语，进行学校本位管理模式的教育改革，此种改革以放权 (devolution) 策略，赋予各校自行决定的权限，但是政府却是启动者、规划者与监督者，为化解这种控制产生的社会批评，上述改革要求各校须透过家长参与才能拟订自身的发展计划，这种参与产生民主假象，进而能以市民社会的途径掩盖上述控制事实。^③英国的教育改革也展现雷同特性，政府辩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才能增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以确保英国在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优势地位，所以教育改革必须提升学生的学习表现。要达成这种神圣使命，教师必须成为自我提升者，并且其能力必须对社会集体目标产生贡献，由于这种社会话语赋予表现力 (performativity) 一些卓越意义，诸如成就、尊严与荣耀等，所以能重新塑造行动者的心灵，此种关联性显示出，社话语述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技术 (governing technology)。^④因此国家不仅是合法性的行政机器，并且具有创造社会话语的功能，透过信念的建构与传播，国家能建构社会的新需求、利益与秩序，所以因应全球化的需求，许多国家便主动阐述全球价值观的重要性。^⑤

这种统治技术巧妙地隐藏社会控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 (cultural hegemony) 理论说明这种关联性，他认为统治团体无论在取得政权之前或之后，皆必须牢牢掌握文化与道德的领导权，此种领导权使他们能引领社会思维，透过特定价值观的传播，得以将许多社会成员转变成主动的支持者。^⑥因此统治团体必须持续运作有机知识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将统治团体的思维转变为社会主流文化，如此，国家进行隐藏性的社会控制。^⑦国家机器拥有许多重要职位，这成为收编知识分子的关键渠道，这种收编可将危险的对立者转变为忠诚的守护者。^⑧

上述论点说明国家无法维持其客观与中立的角色，因为权力是支配其运作的关键因素，社会精英拥有可观的权力，所以他们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支配者。全球化经济体系足以强化这种关联性，因为全球化需求国际机构以解决跨国纷争，所以国际社会往往赋予这类机构相当大的跨国权限，但是这些机构偏好以国际团结的路径以保护资本利益，而非个别国家的独立主权，这种现象有助于跨国资本精英阶级的发展，并成为影响国家运作的主要人物。^⑨这类团体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个人利益，这展现于国际机构与国家主权的关联性。尽管国际机构可能削弱个别国家的主权，但是大部分政治人物却乐于参

①N.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8, pp. 74—119.

②M.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nguin, 1991, pp. 135—169.

③J. Codd, L. Gordon and R. Harker, "Educ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Devolution and Control Post Picot", in A.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and A.S.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63—272.

④S. Ball, "Performativities and Fabrications in the Education Economy: Towards the Performative Society", in H. Lauder, P. Brown, J. Dillabough and A. Halsey (eds.),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92—701.

⑤C. McCarthy and G. Dimitriadis,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edia,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in H. Lauder, P. Brown, J. Dillabough and A. H. Halsey (eds.),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98—211.

⑥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p. 57—61.

⑦A. Gramsci, "Hegemony,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J.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London: Harvester and Wheatsheak, 1994, pp. 215—221.

⑧R.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Kitchener, Ontario: Batoche Book, 2001, pp. 114—126.

⑨W. I. Robinson,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3—53.

与国际事务,也强力支持跨国组织的设置,因为透过这种途径,可提升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力,以取得更大的个人利益。^①

上述分析显示出,在权力的支配下,国家不但丧失客观与中立角色,并且成为社会精英获取个人利益的权力场域,因此受制于权力精英的个人利益,文化保存难以成为国家政策的核心议题。同时,这种利益导向将拉大国家政策与地方需求的落差,如此,国家政策便难以整合个别化的能动性,这将阻碍文化保存的推展。但是,若从上述权力与利益的关联性作思考,当文化产生资本利益时,将可克服这些问题,因为这符合权力精英的利益法则,能使他们重视文化保存的议题,进而使文化保存成为国家的重要政策。此种经济利益也使地方居民受益,藉此能将他们的个人化能动性整合于文化保存的集体行动中,因此文化资本主义(culture capitalism)可产生文化保存的作用。

四、文化资本主义与校本课程

全球化可能带来文化同质化的冲击,进而危及地方文化的发展空间。例如全球化引发大规模制造模式,这明显压缩商品的多样化。^②再者,美式强势文化入侵也冲击到许多国家的地方文化,美国化与麦当劳化等反映出学界对这种文化冲击的担忧。此种担心至少投射于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前述段落已阐述这两者的意涵,概要而言,前者是以文化本土化策略来捍卫国家主权的政治行动,后者是从文化的独特意义来凸显地方文化的价值。无论如何,这两种意义已汇流成保护地方文化的社会思维,由于教育具有保存与传递文化的功能,这使一些学者主张,学校应该担负保存地方文化的使命。^{③④}但是此种路径有其局限性,因为将挤压到现有的课程结构,并且文化保存,至少在中国社会,并非考试内容的核心,所以难以构成学习重心。再者,虽然教育具有社会化(socialization)功能,^⑤但是真实社会情境的社会化功能更为强大,因为教育往往传递理想概念,致使与社会的现实需求产生落差。同时,学校场域之外的社会化历程更久远与持续,如此将大幅削弱理想概念的影响力。上述文化保护运动促使国家采取某些作为,尽管许多政府颁布相关政策,但是这种路径面临一定程度的结构限制,道理在于国家资源并非无穷尽,而且社会福利、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等往往是施政的主轴,并且需求庞大资源。此种大前提说明,很难用有限的国家资源,广泛且有效地推动文化保存工程。

因应此种困境,本文认为文化资本主义可扮演辅助角色。文化资本主义往往被视为利益剥削的代名词,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抨击,资本家以商品化路径贬抑艺术的精神意义,古典乐曲由复杂的音符构成各种旋律,以刻划出精神世界的多元化细腻情感,但是流行音乐仅重复简单的旋律,所以无法升华人的精神世界。^⑥再者,文化工业以娱乐型态将观众推向迷幻世界中,剥夺其反思与想象能力,因为文化工业成功调和普遍性与特殊化的差异,代表特殊化的风格已被整合入普遍性之中,进而使标准化的大规模制造取得合理性。尽管这难以使消费者保有完整的个性,但他们却沉迷于这种欺蒙中,因为电影以机械再生产的途径呈现真实生活情景,或是驱动观众的偶像崇拜心理,这种娱乐

^①S. D. Krasner, "Sovereign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J. Krieger (ed.),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Power*, New York: Pearson, 2006, pp. 71—93.

^②G. Ritzer, *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Pine Forge, 2000, pp. 118—137.

^③A. Green,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in H. Lauder, P. Brown, J. Dillabough and A. Halsey (eds.),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6, pp. 192—197.

^④C. Máduta,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Effect upon Present Local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Arad County from Romania",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116, 2014, pp. 2847—2851.

^⑤T. Parsons, "The School Class as a Social System: Some of its Functions in American Society", in A.H. Halsey, J. Floud and C. A. Anderson (eds.), *Edu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The Free Press, 1961, pp. 434—455.

^⑥T. W. Adorno, "On Popular Music", in J.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London: Harvester and Wheatsheak, 1994, pp. 202—214.

教导观众所应期望之物。^①如此,文化工业将人界定为抛售商品的对象,藉由娱乐将人与商品做连结,例如好莱坞电影工业运用虚幻与壮阔的视觉享受,来召唤广大观众。^②

尽管文化资本主义存在上述问题,但却能发挥文化保存的积极作用。其关键点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生成于社会结构中,因为个体的成长历程包含吸纳与参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双重历程。^③如此,地方文化是当地居民与其社会情境相互协调后的产物,这种互动产生集体记忆,并构成他们的认同,因此地方文化成为联系地方居民情感的重要媒介。由于既有的集体性经验与社会文化深植于他们的记忆中,这些记忆往往影响行动者的思维方式,这种关联性使社会成员成为文化载体,以传播既有的文化内涵。^④共同记忆、认同与文化载体的连结,使居民成为保护与传承地方文化的主要实践者,但这往往停留于文化的精神层面,较难外化成稳固的集体行动。文化的经济利益往往能产生这种外化作用,因为人是心物合一的复合体。财富不仅反映个人的能力,并且也影响个体生活的舒适性甚至优雅性,这种关联性说明,物质能藉由心理感受产生心物合一的作用。基于此种原则,若能将地方文化转化为商业资源,则可为当地居民带来新的财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种循环将使居民洞悉当地文化的市场价值,继而使他们以集体行动保护当地文化。此种关系显示出,地方的商业优势条件能将个别化意图融合成集体形态,此种途径演化居民的共同记忆,并持续改变地方文化的形式。^⑤

基于上述原则,文化旅游能证实文化资本主义的正面功,现代化往往压抑地方文化的发展空间,诸如大都市充斥许多现代化建筑物,由于这类都市具有先进的象征,这使许多中小型城市继而仿效大都市的风貌,这种涟漪效应明显贬抑传统生活型态,并压缩地方文化的发展空间。然而,在经济落后地区,这种现代化的影响相对有限,因而地方文化得以延续。此时,都市居民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但承受相当大的工作压力,旅游成为他们释放压力或是解除苦闷的重要渠道之一,地方文化的独特意义具有唤醒都市人传统记忆的作用,所以地方文化便具备文化旅游的功能。文化旅游可为当地居民带来庞大商机,使当地居民受益,这种商业与文化的结合使他们洞悉到文化的经济作用,此种经济效益能将个别化的认知汇流成共识,进而使居民以集体行动保护与发展当地文化。尽管此种市场经济取向存在文化庸俗化的问题,但是这种途径能产生文化保存的作用,由于文化具备精神意义,所以得以免除这种庸俗化危机。

换句话说,文化资本主义彰显地方文化的经济效益,此种效益能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透过心物合一路径可活化居民的集体记忆与认同,这能使他们采取集体行动保护地方文化。文化资本主义也能使国家更加重视文化保存,因为文化的商业资源符合社会精英的利益法则,所以文化保存的教育方案能成为国家的重要课题,此种转变可将地方居民的能动性整合于国家的教育行动中,或是使国家的教育方案呼应地方居民的期望。基于文化资本主义的正面功能,校本课程的建构至少应把握共同记忆、独特意义与文化资源等三大法则:文化是当地居民的共同记忆以及认同,校本课程的文化保存要能唤醒这种共同记忆,并将之转化成集体行动,应将当地居民纳入这种课程的建构历程中,参与不仅能凝聚居民对文化保存的共识,将他们整合于集体行动中,以精确掌握共同记忆的元素,并可运用他们的能动性,对地方文化进行新文本的创建。再者,这种校本课程应发掘当地文化的独特意义,因为独特性才能产生差异性,差异化才能提升文化的经济效益。这种市场经济效益进而说明,这类校本课程应修正纯学术的理想路径,转而结合社会变迁的情境脉络,将当地文化的独特意义紧密连结文化消费市

①T. Adorno and K. Horkheim,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S.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29—43.

②W. Benjam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1968, pp. 217—237.

③J. Clarke, S. Hall, T. Jefferson and B.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in T. Bennet, G. Martin, C. Mercer and J. Wollacott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 Process*,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td., 1981, pp. 53—81.

④J. Wollf,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Art.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93, pp. 51—63.

⑤M. Felicetti,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Matera as a Cultural District",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223, 2016, pp. 614—618.

场的需求,这种结合才能确保地方文化的经济效益,使当地居民成为真正的文化受益者。这种共同利益能大幅提升他们在校本课程的参与度,透过这种循环,这类校本课程不再独立于社会情境之外,而是与当地居民融合一体。

五、结论

一些学者认为,加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使许多国家暴露于强势文化入侵的政治危机中,由于文化是国民的国家认同基础,所以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必须采取文化本土化的策略以保护本国文化。上述论点采取抗拒取向的思维,认定国家主权是社会成员集体意识的结晶物,国家拥有最高权限来启动集体行动,国家启动的文化本土化策略可有效化解强势文化的入侵,然而此种结构取向大幅低估个体的能动性。有别于抗拒论,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在地化为能将全球化特性融合于国家的自身需求中。此种融合取向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创新作为能使行动者脱离社会结构限制的束缚,个人偏好使消费者成为商品的主宰,因为主观意向决定文本的定位与意义。

本文提出文化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化解上述两种取向的矛盾,亦即以文化的商业利益整合国家集体行动与个人意向,此种整合能使国家成为文化保存的积极建构者,其政策有利于地方居民运用其能动性,来发展地方文化。特别是社会精英关注资本利益,他们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驱动者,所以文化的商业利益能使文化保存成为国家的重要政策。同时,这种商业利益不仅能改善地方居民的生活条件,并可将他们的内在认同外化成集体化行动。如此,文化资本主义能使国家重视文化保存议题,同时也能将个人能动性整合于国家政策之中。这种融合可衔接校本课程传递的理念,因此可大幅提升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并藉此能培育出具备文化传承素养的下一代。

(责任编辑:程天君)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of Culture Capit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JIANG Tian-hui

Abstract: The globalized system assists America to acquire its hegemonic status that benefits the USA to export its hegemonic cultur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this milieu makes people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status of local cultures, it has stimulated two contradictory arguments.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ocalization highlights the linear relation among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e sovereignty. In contrast, the notion of glocalization valu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With regard to this debate, those who favor cultural localization adopt the idea of resistance, but those who support glocalization prefer the concept of fusion. Obviously, these two camps both ign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ncy and social structure. As culture capitalism meets the interest need of power elites who direct the operation of the state, cultural preservation can become the priority on political agendas. This situation benefits local inhabitants to employ their agency to elaborate local cultures.

Key words: cultural localization; glocalizat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culture capitalism; school-based curriculum